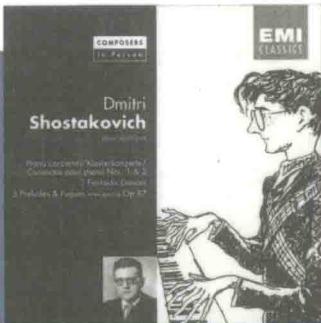


古 典 乐 耳 读 手 记

旧事贵阳丛书 来自星空

LAIZIXINGKONGGUANGUERDUSHOUJI

袁政谦 / 著



张海冰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本书由贵阳市宣传文化事业发展专项资金资助〕

旧事贵阳丛书

来自星空

LAIZIXINGKONGGUODIANGUFERDUOSHUJI

古典乐耳读手记

袁政谦 / 著



主编 / 戴冰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旧事贵阳丛书 / 廖国松, 袁政谦, 和国正著. -- 贵阳 :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4.7

ISBN 978-7-221-12011-3

I . ①旧… II . ①廖… ②袁… ③和… III . ①散文集
—中国—当代 IV .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01323号

旧事贵阳丛书 来自星空

主 编 戴 冰

著 者 袁政谦

责任编辑 黄 冰

装帧设计 丹 丽 廖鸿鸣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社 址 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邮编：550001）

印 刷 恒美印务（广州）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mm 32开

印 张 24

字 数 600千字

版 次 2014年06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0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1-12011-3

定 价 72.00元（全套三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 戴冰

《旧事贵阳》丛书的三个作者，廖国松、和国正、袁政谦，都是我父亲的多年同事，我几乎从小就认识他们，算我的师长辈。一九九八年我调进《花溪》杂志编辑部，更直接跟他们成了同事。那个时候，《花溪》已经改版走市场，本质上跟文学没半毛钱关系，大家一致懒心无肠，上班时间就每人一杯茶，围着烟灰蓬松的小烟缸闲聊。他们三个，还有张永龙，都是老贵阳，特别是廖国松、和国正，一肚子逸闻趣事加奇谈怪论，听得我瞠目结舌，常有种饱胀过度就要隔食的感觉。几个人的内容、风格又都不一样。廖国松偏野，和国正偏俗，袁政谦偏雅，张永龙偏冷。大多情况下是廖、和二位主讲，如唱双簧，如打擂台，你一段，我一段，层出不穷，像在说几辈子的故事。袁政谦只在听到夸张离奇处带着不置信的表情质问一句，而张永龙常在他们说完一段后，平淡地说出一个决绝的结论……

厮混久了，潜意识里渐渐把他们当作家人一般，偶尔会惶恐，他们年纪都比我大得多，早晚一个个退休回家，办公室里冷清下来，那上班就真的是工作，毫无乐趣可言了。但再惶恐也没用，时间不滞不留，他们一个个还是退休了，回家了。先是廖国松，然后是张永龙，再下去是和国正。袁政谦比廖国松小一轮，继续领导了好几年，最终也当然地退了。

三年前，我打算写一组有关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中期贵阳一帮玩摇滚乐的年轻人的系列散文，写到一半，想起他们几个斑驳如老墙的经历，心想何不一人写一本，凑成一套有关贵阳记忆的丛书呢。于是便去撺掇他们。四人原本都是有成就的作家，但在他们退

休之前好几年，实际都不怎么动笔了，要劝得他们重新拿起笔来，伤神耗气，写这样规模的一部书稿，是个难事。好在我太了解他们了，事先替他们想好的选题内容，都是他们最熟悉也最津津乐道的那部分生活：廖国松写他的画友们，和国正写他的市井奇人奇事，袁政谦写他的古典音乐。一说，三人都爽快地应承下来，而且立即动笔，一年左右便差不多完成了初稿。

只有张永龙，我原想请他写知青，不想才开口，就被他一口回绝。不久，又读到他应某报所约写的小文章，谈文学创作，其中提到他儿子小时候想写小说，他竟如大祸临头，就像儿子半个身子已经掉进了火坑，但又怕儿子正在兴头上，一反对，说不定更逆反，于是耐住性子等待时机，直到儿子写厌了，自动放弃，这才暗叫一声侥幸，心有余悸地开导儿子，说写作这事啊，“最后必弄得你生不如死”。话说到这个份上，我也就不敢再提。张永龙是个有着独特艺术感觉的作家，笔调阴冷抑郁，犀角烛怪，他很早停笔的原因，在我看来，正是不入俗人眼而心灰意冷的结果。这套书里缺了他，我始终觉得是个遗憾。

三本书稿是出来了，却一直因为出版资金没有着落而闲置着，直到二一三年，终于得到市委宣传部出版基金的支持，才算功德圆满。

克洛奇曾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觉得一切历史其实也都是个人史，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者一座城市的集体记忆，归根结底也都是由个人记忆所构成。从这个意义上说，《旧事贵阳》的三本小书，也许狭窄，也许偏颇，但绝非无足轻重，都是为贵阳的集体记忆凑了自己的一份子。

书本身的内容如何，不由我多话，读者自己可以结论。这里要说明的是，我曾为三个作者分别写过一篇人物素描式的东西，现附在他们各自书前的序文之后，算一种补充，可以让读者通过这些文字，对作者有一点些微的了解。

附：

袁政谦老师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正是文学和文学期刊的黄金时代，每年，政府都会给各级文学期刊下拨专款，举办各式笔会，短者十天半月，长者可数月之久（我听说过从夏天办到秋天的）；贵州的两本纯文学公开刊物，省文联的《山花》月刊和市文联的《花溪》月刊，每年也都会举办至少一次笔会（有时甚至两次），我就是跟着在《花溪》月刊工作的父亲开笔会，这才第一次见到袁政谦老师的。那时我还是个高中生，他已经是崭露头角的年轻作家了。不过那时崭露头角的年轻作家很多，大都兴高采烈意气风发，他却恰是个沉默寡言的人，所以对他印象不深，唯一的记忆是某个黄昏，大家晚饭后三三两两踱到附近的湖边，我无意间回头，正看到他离开人群，侧身坐到一块石头上，然后抬头向远远的湖面看过去……

回来后，我偶尔就会在文联大院，或者通向文联大院的斜坡上碰上他，那时我和父母住在文联大院，他则刚调入文联不久。但除了碰上时我恭恭敬敬叫一声袁老师，他温和地笑笑之外，我们仍然没有一点交道，就这样过了十多年。这期间我在各种文学期刊的目录上看到他的名字，看到他的中短篇小说集和长篇小说摆在书店的柜台上，也听到不少有关他的小说的谈论，但奇怪的是，那样长的时间里，我竟然从没有认真读过它们中的任何一篇，甚至到我和他成了同事，经

常一起谈论有关小说的话题……也还是如此。为什么会是这样？这问题曾让我百思不得其解，也和袁老师本人探讨过，他想想说，可能我不是那种引人注目的人吧。这话当然有自谦的成份，但并非毫无道理，他确是那种处世过于低调，甚至接近自我贬抑的人，我没见过他高谈阔论，没见过他使用激烈的手势、表情或者高级别的形容词……

这种状况自我调进文联，又延续了整整十年，直到前段时间他要出版他的新小说集了，嘱我写一篇序言之类的东西，我这才终于有机会把他最成熟时期的作品读了一遍。说实话，同样作为一个写作者，我与他在气质上是大相径庭的，但这并不妨碍我被他的某些作品所感动，甚至深深感动。他的作品往往是平淡的，或者貌似平淡的，但在这种平淡之下，却能读到如他为人一样含而不露的才华，读到一个作家历经世路后对人性所抱有的不忍之心和不闻浩叹的对人生的怅然之情……读完之后，我对他说：你的名声低于你的实际水平。他想想，清清喉咙，小声说：也有别人这样说过……

而我了解他对音乐的了解，却要比了解他的小说早得多。

最初的印象是他和廖老伯为父亲用中密板做音箱，做好后，嵌在父亲专为此设计的博古架的两侧。从此我知道他喜爱音乐。但真正了解他对音乐喜爱的程度，以及由此积累的大量相关知识，却是在我也到了文联之后。我少年时听过不多几部西方古典乐，但后来迷上摇滚乐，几乎就再没听，直到搬家换了音响（也是袁老师作主配置的），这才突然想认真听一听交响乐，觉得那样似乎才不至虚置了如此的设备（其实按袁老师的说法，我的新音响不过才是入门的级别），于是从父亲那儿拿了几张CD来听，渐渐竟听出点感觉来。有点感觉就忍不住想找人说，而天天见面又喜爱音乐的便只有袁老师了。我原本只

是随便聊聊，但他一听我主动聊音乐，两眼却放出光来，话也多了，那神情比平时生动许多。记得那个上午我们聊了一个多小时，开饭时间到了，众人拿碗执筷，纷纷催促我们，他这才勉强起身。过了两天，他邀请我去听他的音响设备（据说价格要比我的贵五六倍），约好下午去，他早上就开机了，说要把设备“煲”到最佳状态。那天他放了几张CD，有器乐，有声乐，其中一张男声四重唱的碟片，是当时大热的“八只眼”合唱组的录音，听完，他问我什么感觉。我用手比划了一个直径一尺的圆，说这几个人的喉咙像有这么粗。他敏锐地看我一眼（我第一次看到他有这样的眼神），若有所思，慢慢说：嗯，这算一种新的形容。

袁老师是《花溪》月刊的主编，差不多每月都要去广州签印杂志，原本我以为这对他来说是个苦差，但他每次都兴致勃勃出发，高高兴兴回来，原来他在广州可以大淘正版的走私碟，所谓“水货”。自从那个聊音乐的上午之后，很长一段时间， he除了指使我买一些诸如《唱片圣经》、《西方文明中的音乐》之类的书，每次去广州，还总要给我带回十来张他认为我应该知道和保存的作品；而且拿给我时，每张碟片的说明书上都会粘着一帧方寸大小的黄色纸片，上面用工整的字迹标明这是哪位作曲家的哪部作品，还有乐团、指挥或演奏家的名字，以及出版的公司等等。我不过意，说不用写了，太麻烦，我自己慢慢查吧。他却说平时听音乐，已经养成一面听，一面翻阅各种有关资料的习惯，随手给我写下来，并不麻烦，反倒很愉快。那几个月，应该是他对我寄望最高的时期，经常一见面就问我：昨天听没有？或者：昨天听的哪一张？说实话，我没他那么着迷，虽然每一部都听得十分认真（关窗拉帘、居中端坐、闭眼凝神），但正因为每听一部都十分

认真，所以每次听完都有种“饱胀”感，接下来的几天除了“消化”，很难再有余力继续。于是他殷殷的频繁询问有时就弄得我很难堪，我或者撒谎，说昨天重听了一遍某某的某部作品，或者说昨天下午家里来了某个客人，缠我半天，没听成，而晚上又不敢听，怕闹着邻居……有时实在找不到理由，就说写东西呢，没时间。我“没时间”的次数多了，他就警觉起来，遗憾起来，某次甚至用带点哀求的口吻说：你坚持听嘛，要不我连个聊的人都没有。这话给我印象很深。事后我意识到，他确乎是不怎么跟别人聊音乐的，也没见他跟别的所谓的“发烧友”交往。个中原因，我觉得一是他天性不喜扎堆，其次他是个作家，理解音乐也许别有怀抱，比如他和我聊音乐时，就常以文学作品和作家辅证：谈论俄国音乐时会提到某个俄国作家、谈论德国音乐时会提到某个德国作家，或者以某个国家文学作品的总体气质比较那个国家音乐的总体气质……幸好他以如此的方式谈论音乐，我勉强可以插几句嘴——比如我某次突然灵机乍动，说小说的情节就好比音乐的旋律，他点点头；我又说音乐史和文学史有相似之处，音乐史越往后旋律性越弱，就像文学史越往后情节性越弱一样，他再点点头——否则我跟他的音乐知识实在相差太远，根本只有他说我听的份。

某次聊得高兴，我脱口而出：你的音乐修养好像超过你的文学修养呢。说完我有点后悔，毕竟文学是他的专业，音乐不过是爱好。但他微微颌首，欣然接受。

二〇〇二年，我策划了一份文艺随笔季刊《艺文四季》，其中有一个“视听”栏目，专门谈论电影和音乐，第一期就向袁老师约稿，他却连连摇手，说聊聊天可以，真写出来，怕搞专业的笑话。我引诱

他，说艺术欣赏哪有绝对答案，你从个人角度谈谈听碟的感受，谁会说什么？再说了，有些搞专业的怕还未必有你说得好呢。好说歹说，他勉强同意点评十张碟片。发表出来，反响不错。他于是来了兴致，陆续写出二十多篇，大多就发在《艺文四季》的“视听”栏目里，其中几篇，还被诸如《爱乐》这样的权威专业杂志转载。我继而建议，说你积累了这么多年，何不干脆写本书？零敲碎打没意思。他反应谨慎，说这么个大工程，得好好想想。但他终于开笔，历时一年，完成了一部题为《来自星空》的书稿。其中除了听音乐、玩音响、淘碟片的过程之外，还评说了三十六位作曲大师及精选的一百多张碟片，范围涵盖西方古典乐史的各个时期——由此可见，我说他音乐修养高过文学修养，并非夸饰之辞，让他写本谈论包括西方文学史各个时期作家和著作的书，他未必写得出来呢。

有个上午，我和他无意间讨论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似乎都兴味索然，末了，眼睛不看我，微微微笑说：……只有听听碟嘛，好像还有点意思。但事实上，袁老师能听音乐的时候却不多，甚至很少，因为他怕影响别人，只能周遭无人时，才祭祭耳。二〇〇六年之后，有近一年时间，各种条件具备，他得以大听特听，常常听到深夜。有几次他情不自禁对我感慨：过瘾，听得真过瘾……可以想见，在很多不能听音乐的时间里，面对哑默的音箱和数千张碟片，那情形大概无异患糖尿病的饕餮之徒置身于山珍海味的盛宴之中。

他邀我去听音响的第二天，我问他：昨天我走后你又接着听没有？他想想，说：又听了几声。听音乐以“声”为单位。真是天可怜见。

目录

1// 序 戴冰

听乐记

- 003// 老唱片和手摇唱机
- 006// 没有国界的电波
- 009// 空置的电唱机
- 011// 我的第一台磁带录音机
- 014// 磁带记忆
- 017// 月光
- 020// 关于“发烧”
- 022// 激光唱机的诱惑
- 025// 初试CD
- 031// 自制音箱
- 033// 摩机
- 036// 失而复得的CD机
- 039// 你能听多少音乐
- 042// 盗版碟与打口碟
- 046// 外文书店
- 048// 音乐随笔
- 066// 广州淘碟
- 070// 一本有关音响的书
- 072// 《爱乐》杂志
- 079// 琴事
- 084// 我们需要多少唱片

- 087// 一张 CD 的故事
094// 看傅聪先生弹琴
099// 音响升级
103// 贵阳交响乐团印象

大家小谭

- 108// 引言
110// 巴赫
114// 亨德尔
117// 海顿
120// 莫扎特
124// 贝多芬
128// 舒伯特
132// 柏辽兹
136// 门德尔松
139// 肖邦
143// 舒曼
147// 李斯特
150// 瓦格纳
155// 威尔第
158// 斯美塔那
162// 布鲁克纳
166// 勃拉姆斯
171// 圣 - 桑

- 174// 穆索尔斯基
179// 柴可夫斯基
184// 德沃夏克
188// 格里格
191// 福雷
194// 亚纳切克
198// 马勒
203// 德彪西
207// 施特劳斯
211// 西贝柳斯
215// 沃恩·威廉斯
219// 拉赫玛尼诺夫
223// 拉威尔
226// 巴托克
230// 斯特拉文斯基
234// 普罗科菲耶夫
238// 科普兰
241// 肖斯塔科维奇
246// 布里顿
250// 结语
- 251// 后记

Chandos

DVORÁK
Piano Trio No. 4
in E minor Op. 90, 'Dumky'

SMETANA
Piano Trio
in G minor

THE
BORODIN
TRIO



DIGI

||
听
乐
记

老唱片和手摇唱机

我父亲有不少黑胶老唱片，全是西方古典音乐。他还有一部手摇唱机，即那种用上发条来让唱盘转动的老式机器。小时候，偶尔会听到他用手摇唱机放唱片。那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事。

成年后才知道，当时听那些唱片显然有些不合时宜。那个时期革命歌曲铺天盖地，西洋音乐被视为资产阶级的东西。不过，手摇唱机音量很小，关门闭户在家里放一放唱片也算不上张扬。尽管是这样，我母亲还是表现出某种担心，她并不乐意他听那些东西。因此，我父亲其实也很少听。

我记得那些唱片有些是单张的，一个封套装一张；有些是成套的，一个硬纸壳盒子里装好几张。封套和盒子上印得有外国人的头像和外国字，彩色的，十分精致。我父亲很爱惜这些唱片，用厚布一叠一叠地包起来放在柜子里，听的时候才拿出来。他肯定听过不同的曲目，而我那时对音乐一无所知，也全不在意。有印象的只是我父亲听得最多的一张小提琴，很多首曲子中，有一首我觉得非常好听，能哼出其中的一段旋律。但仅此而已，根本不会想到去问问这曲子出自哪位作曲家，叫什么名字，而那段优美而又忧伤的旋律，仿佛自然地就印在我脑子里了。很多年之后，当我开始收藏 CD 时，才知道那首曲子是根据俄国作曲家里姆斯基 - 科萨科夫的歌剧《萨阔特》中的一段旋律改编的，叫《印度客商之歌》。现在，这首小提琴曲依然让我感动。

我父亲的这些老唱片全部毁于“文化大革命”初期。

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以后，全社会“破四旧”，很多人都赶紧处理可能引起麻烦的器物、书籍、字画等东西，有的转移到别处藏起来，有的干脆毁掉不留后患。我母亲那时已经被隔离批斗了（她是贵阳一所小学的教导主任），我父亲担心红卫兵来抄家，那些唱片肯定是罪名。唱片又多又重，一时找不到地方藏，于是只好匆匆毁掉。

唱片的包装盒跟封套要好处理些，撕开烧掉便化为灰烬；是分成几次烧的，我家住在学校的教师宿舍，集中烧的话会弄得烟雾腾腾，别人会怀疑在焚毁什么东西。唱片的处理却要麻烦得多。我父亲先用钉锤将唱片打碎，然后由我和弟妹三个人，分别一包一包的把碎唱片带出去扔掉。我记得有些扔在垃圾堆里，有些撒在教学楼后面那片树林的草丛中。这样处理了其中的大部分。扔得太多了也怕别人注意，另外的一小部分，我父亲用搪瓷盆烧水，水开了将唱片放入盆中，待唱片在开水中变软后，用钳子轻轻把唱片的边整个一圈朝上折，取出来冷却后，那张黑胶唱片就变成了一个呈荷叶边的盘子。这样的盘子大约做了十多个，可以用来装一些不太重的东西，但经不得摔打，因为胶木唱片薄而脆。盘子送了一些给别人，剩下的自家用。几年以后，这些盘子就陆陆续续用坏了。

我那时自然不清楚这些唱片的价值。不过，我一直记得唱片上的一些商标，比如一条狗狗蹲在老式唱机大喇叭前的那个图案。现在我知道，那些唱片大都是胜利（RCA victor）、百代（EMI）等大公司出品的。至于那张小提琴，可能是某位小提琴大师的专辑，可能上面还有《梦幻曲》一类的小品，但我记得的唯有《印度客商之歌》中的那段旋律。我想，要是那些唱片能保存到现在的话，应该是古董了，因此想着就觉得可惜。

唱片没有了，那部手摇唱机就被我父亲塞到床底下去。直到